



谈国学
前提是如何定义国学

读品: 最近几年中国出现国学热,您有什么看法?

包弼德: 首先看国学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把国学定义为中国人文,包括艺术、哲学、文学、历史学、音乐等门类在内,我觉得非常好。国学,就是文明的历史。就如在西洋,也有自己的人文课。也有人讲,国学就是儒学。如果这样定义的话,就比较复杂了。儒学的概念本身就比较复杂,2000多年来,变了几次,汉代的儒学和宋代的儒学就不一样。近代儒学分为制度儒学和修身儒学。有人认为,儒学应该是政治层面的改革,这不现实。

读品: 您曾经研究过的人物,最有趣的是谁?

包弼德: 我研究过中国古代一些人物,比如,孔子、孟子、孙子、老子、庄子等。我觉得庄子比老子有意思,为什么这么说?你去看看《庄子》和《道德经》就知道了。孙子的兵法很有意思,我也喜欢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很多有意思的作家、思想家。唐代盛产大文学家,杜甫和白居易比较而言,杜甫比白居易有意思。我对韩愈也有兴趣,还喜欢背诵欧阳修和苏轼。我虽然不是道家,但我认为朱熹在世界思想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人。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章太炎、梁启超都很有意思。当代的毛泽东也是一位思想家。我研究中国思想史,并不是特别对哪个感兴趣,也不是因为出于个人爱好,而是因为那些历史很重要。

读品: 中国人常说文史不分家,作为一位史学家,您怎么看?

包弼德: 这个说法很有趣。虽然说文史不分家,其实已经分开了。你看我的《斯文》那本书,里面说从唐代到北宋,士大夫思想的主流是文学。在唐代和北宋,大学问家搞文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是主流,程颢程颐等是非主流。但是,那个时代,道学否定文学的主流地位。这里说的文学,和中国现代的文学又不一样,现代的文学观念是从西方的Literature来的。所以,所谓文史不分家,涉及的概念也比较复杂。

读品: 您最近在研究什么?

包弼德: 最近还是在做中国的思想史,以及历史地理和地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另外,我们在做两个重要的数据库。一个是与复旦大学合作的“中国历代地理信息系统”,目前已经可以使用,而且在不断地完善。另一个是“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是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及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合作的项目。



美国汉学家包弼德

包弼德:我为什么研究“新儒学”

包弼德举起手,一边用拇指和食指刮擦着脸颊,一边凝神思考。在回答学术提问的时候,如果对方的问题冗长复杂,他偶尔会有这样的动作。简短的整理思路之后,他迅速地有条不紊地把答案抛给提问者。他的汉语标准流畅,如果不是高大的身躯和明显的外貌特征,你几乎会忘记,他是一位美国人。而他研究的领域,是让相当多的中国学者都望而却步的中国思想史。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文 马晶晶/摄

史,你就没有办法了解中国。如果你不了解中国古代的经书,不了解思想



包弼德

Peter Kees Bol
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主任、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出版著作多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历史上的理学》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 包弼德与中国结缘,起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

“1965年,我是中学三年级的学生。那个夏天,学校开了一门特别的课程,汉语,我就去学了。”简短的学习,让他为自己今后的专业学习找到了方向。1966年,包弼德进入大学,他想选择的专业是现代中国政治,“当时的美国,像我那样的人很少。那时候,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觉得很不合理。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国家,它的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美国应该了解它。”

专业的选择并不顺利。当时的中国,正在开始一段特殊的时期,“外国学生想去中国大陆,开始变得很难。1966年,我去了荷兰,并去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那一年的气氛还很正常。1967年,我又去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情况有所变化了。我感到我要学习中国政治的想法,可能实现不了了。”包弼德转而开始学习中国历史,“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改变美国国内的一些态度。”

为了学习中国语言和历史,包弼德去了中国台湾。“我开始读中国的经书。从1315年到20世纪初,在中国,所有的士大夫,都要读这些书。那时候的思想,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不读四书五经,就无法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就好像一个中国人,如果要学西洋的历史,如果不了解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不了解《圣经》,就很难去理解。如果不读中国的四书五经,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而不是那样的选择。”

包弼德在台湾一呆就是四年,回国的时候,他已经找到了自己未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

1982年,包弼德获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后在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工作,一直致力于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研究。1985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并在那里攀上学术生涯的高峰。

2 1992年,包弼德出版了一本英文版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著》。该书后来陆续有韩文版和中文版问世,中文版的书名为《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斯文”,出自《论语》。

“有一次,孔子经过一个叫匡的地方,被当地人围住了。匡地的人,曾经受到鲁国阳虎的掠夺和残杀。孔子和阳虎长得很像,被误认为是阳虎。面对这种情况,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在这段话里,孔子作出了两点声明:“斯文”并没有随文王的去世而断绝,并且得到了“天”的认可,而孔子,就是要继承“斯文”,顺应“天”的意愿。包弼德从“斯文”出发,沿着时间的脉络下行,关注中国唐宋时期思想的转型。

“我最初研究苏轼及苏门,关注11和12世纪的思想文化。为了寻找北宋精英文化的来源,我上溯到唐代后期的历史,并将它与初唐的学术进行对比。当我开始探究唐代后期与北宋的思想创造如何与唐代门阀文化的消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也逐步理解了新儒家运动的追求。”

包弼德认为,唐代,斯文开始首先指称源于上古的典籍传统。唐宋的学者掌握这些传统,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公元7世纪,唐朝学者努力融合传统中的不同流派,借此建立一种文化的综合形态,以支持新统一的国家。“但是,在公元8世纪后半期,唐朝面临着帝国分裂和藩镇叛乱,那些为了挽救斯文的文士,开始谈论‘圣人之道’与‘古人之道’。圣人不再师法宇宙,而是将目光转向了‘人事’,他们体察并顺应人情之常。北宋年间,人们一直想对‘道’与‘圣人’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解释,最终激发出了一种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这些观念在改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用心深远。”

2001年,《斯文:唐宋思想的转

型》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第一版。2017年,该书即将江苏人民出版社再版。一本原计划主要面对英文学术读者的专著,意外在中国收获成功,让包弼德颇感意外。“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可能是因为中国学者更喜欢不受哲学、文学、社会和政治等学科的束缚,而我的这本书,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

在包弼德看来,大概除了在中国,没有哪个国家会出现这样一部思想史:它横跨六个世纪,同时又是一部政治史、社会精英史,还有对文学价值观的研究。

3 2008年,包弼德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历史上的儒学》。2010年该书中文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包弼德在书中讨论在宋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新式儒学。这是一场从北宋二程的哲学观念发展出来的思想运动。南宋的朱熹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广泛严密的哲学与文学系统。到了明代,王阳明的理学实践提供了新的诠释。为什么要关注宋明理学?“朱熹对四书的注解在公元1315年首次成为科举考试的部分内容。虽然到了17世纪,居于领袖地位的知识分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理学教义直到1905年仍然是精英教育的一部分。在这七百年中,理学始终是中国精英思想的一部分,无论他们赞成或反对。”

包弼德说,他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觉得有恢复理学的必要,而是觉得这个学派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他一直秉持着自己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初衷,“如果你不了解中国古代的经书,不了解思想史,你就没有办法了解中国。”

包弼德研究的重点在中国古代史和思想史,但又不拘泥于此。这些年,他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课——《现代中国的思想争论》,主要就是讲最近30年以来中国的思想争论。

他是如此了解中国,他又是如此勤奋,以至于中国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根本无法忽略他发出的声音。

大读家

读书人,写作者
与他们的思想现场